

大侠远去 江湖再见

金庸先生昨日逝世，享年94岁

本报综合消息 2018年10月30日，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，享年94岁。

金庸本名查良镛，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，1948年移居香港，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，香港著名的政论家、企业家、报人，与黄霑、蔡澜、倪匡并称“香港四大才子”。

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，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，可概括为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外加一部《越女剑》。“凡是有华人的地方，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。”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，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，开创了“新派武侠”的风格。六十年来，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，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金庸是海宁查家的第二十二代孙，出生的时候，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，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。所以，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“当仁不让”的大地主。因为家学渊博，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，“查氏藏书”在浙西一带很有名。

他曾经回忆说：“家中藏书很多，我幼时虽看不懂，但找书却方便；而且不单有古书，也有新书，因为我的伯父、父亲、兄长都是大学毕业。我自小与书为伍，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，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，家里房产亦丰，生活不愁，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，闲来多是下棋、看书……”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，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。

八岁那年，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《荒江女侠》，“琴剑二侠”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。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。之后，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，一睹为快。抗战后，查良镛到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当记者，4个月后，赶上上海《大公报》招聘国际新闻翻译，被录用。1948年3月5日，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，急需一名翻译，24岁的查良镛被委派前往香港馆工作。在《大公报》香港馆任职期间，查良镛先后做过记者、翻译和编辑。

1952年，查良镛转入《新晚报》做副刊编辑，一年后，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，结果一炮打响。之后又开始在《商报》连载《碧血剑》，之后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。1961年，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鸳鸯刀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开始在《明报》连载，接着是《天龙八部》；1972年完成《鹿鼎记》宣布封笔，金庸在退出侠坛后仍称霸武林。



17年前 我被他点名采访

惊闻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，17年前的一幕幕涌到眼前。

2001年，我刚到《贵阳晚报》实习，有一天，看到记者部的几位老师们神秘兮兮又异常兴奋的样子，立刻围过去打探究竟。“金庸来了！”一位老师小声地在我耳边说。

当时金庸正要出席首届中国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，几位老师打听到消息后，准备去机场抢一手新闻，我跟着去了之后，确实把金庸逮了个正着，但是金庸却一言不发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有人给他抬来一张凳子，他便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机场大厅里。在这期间，金庸都没有跟记者们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几个只能靠着他和他的合影，后来才发现，那些合影里，金庸都是貌合神离的样子。

一直跟着迎接金庸的队伍来到酒店，不知等了多久，金庸终于出现在酒店的会议厅，和他的夫人坐在近百名记者围成的圈中，气氛紧张又尴尬。终于，金庸开口了。他对所

有的记者说，他很累，不想接受记者的采访。听到金庸这样说，大家都很灰心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他却朝我站的方向指了过来，说：“我只接受这个小姑娘的采访。”

其实我并没准备问题，一下子就懵了，感觉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上，同行的老师立即用胳膊拐了拐我，叫我赶快问一个问题。我还记得自己问了一个有点傻气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金庸的小说里面男性主角居多，女性主角几乎没有。

金庸怎么回答的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问了问题之后，终于打开了金庸的话匣子，同行的老师乘机把他们准备的问题一一向金庸提出，完成了这次充满“速度与激情”的采访。

后来每每翻开相册，看到我穿着一件10元钱的红T恤和金庸先生的合影，都会想起他点名要我采访他的那一刻，想起那个睿智又充满草根情怀的大师。 ■本报记者 陈问蓉

追忆大师

我与金庸先生的 “三面之缘”

呜呼，先生已歿。好在文字长存，可以不朽，回想十七年前，我采访过金庸先生，算起来可说有三面之缘，往事历历，犹在目前，姑略述其旧，聊以寄托一点哀思。

两千零一年，贵阳举办首届也是唯一的一届围棋文化节，主办方邀请的重量级嘉宾中，有金庸和吴清源二公，时我供职于《贵阳晚报》，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，由我领衔，采写关于金庸先生的报道。

先生抵筑当晚，市里在金筑酒店宴请，但杜绝对报道，更杜绝对记者入场。碰巧出面接待的副市长唐光族和组织部长卢胜伟都是熟悉的长辈，诉说缘由，立马就答应假公济私，我也就混进了宴会厅里，这是第一面。席间闲聊，宾主尽欢，我也趁机插话，自然而然地将话题引到了武侠小说上，老先生兴致颇高，居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，“好吧，为你们破例一次，可以有个简短的采访”。

次日头版见报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题目应该就是《金庸先生为贵阳两次破例》，除了破例接受采访，他还表示，尽管封笔多年，时机合适，也许还会破例再写武侠小说，甚至可能写一部与贵州有关的武侠小说。后者当然只是善意的谎言，毕竟是报人出身，他知道记者需要有新闻点，也许随口给一个噱头，好让我们写稿子。

这篇报道，也是本地各家媒体唯一提前采访到金庸的一篇。可惜的是，几经努力，也没能争取到专访机会，组委会只同意组织一次集体采访。

连夜准备，因第二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，金庸也会到场，我提前拟好二十几个问题，分发到次日能持证上会的几个记者手中，标明序号，一再交待，得到提问机会，必须按顺序来。

又一次赶上了好运气，第一个被点到名字的，是同事王燕达，而我所拟的第一个问题，既切围棋节的题，也吻合他武侠小说巨擘的身份，甚至还略带调侃，“请问金庸先生，您是武侠小说名家，同时也是资深的围棋迷，我记得在《碧血剑》里有一位酷爱围棋的木桑道长，但却是个臭棋篓子，请问，在他的身上，是不是有您自己的影子”。

记得金庸先生呵呵一乐，“这个小姑娘的问题很好，的确，木桑道长的棋力水平和痴迷程度，跟我是有一些相似之处”。

下午集体采访是第二面，安排在花溪公园的一处室内。不大的房间里，记者挤得满满当当，我手持录音机，无处下脚，勉强蜷缩在金庸先生的腿边，尽可能避开电视镜头。因姿势极为别扭，无法掏出纸笔记录，按下录音键，打定主意，回到办公室写稿前，再认真听一遍。

没有悬念的，悲剧发生。晚上赶回报社，才发现我不知如何操作失误，居然一丁点也没有录上去。无暇懊恼悔恨，凭着年轻记忆力好，立马开写，那天不巧空调失灵，酷暑天气，闷热难耐，我脱掉上衣，光着膀子，浸湿一张白毛巾系在头上，走指如飞，一气呵成，写了一个整版的访谈文章。事后回忆，真是有如神助。

还有一个想要补充的细节是，当天采访完，我挤到金庸先生旁边，陪他走了一段，而且还非常谄媚地提及，我大学的毕业论文，所写即为他的小说。不出意外，金庸先生果然大感兴趣，一再追问所写为何。于是很快约定，第二天复印一份送去棋院，留他过目。

这倒是真实不虚的事情，我的那篇毕业论文题目，堪称警牙诘屈，叫做《多角度叙事、悬念与人生困境——“雪山飞狐”的一种诠释》。当年写就，中文系现代文学组的老师们不接招，说是无人研究金庸，甚至也无人读过金庸，搞得我落户无门。好在古典文学组宽容且“金迷”众多，热情接纳，论文答辩几乎成为师生金庸迷的讨论会，七嘴八舌，热烈无比，那一幕，我至今怀念。

论文如约送到金庸先生手中，只是从者如云，好不容易近身，第三面简直混乱无比，一叠装订好的稿子递到手中，便匆匆告辞。也不知他是否也曾翻看？更不知他对后生小子的批评有何感想？

金庸本名查良镛，其族为海宁世家，前不久去嘉兴，还差点动念去看看他笔下的烟雨楼、铁枪庙，惜未能如愿，期以他日再去凭吊吧。 ■周之江



百花湖畔 他欣然赋诗

2001年8月8日，金庸应邀参加首届中国·贵阳围棋文化节，与著名棋手陈祖德、聂卫平等同台论道，他的到来吸引了全城的记者。

当看到一位刚刚毕业的女记者，金庸问她是不是大学刚毕业，刚刚工作？非常亲切。

从贵阳到花溪、百花湖的路上，记者们见缝插针地和他聊天，把他的书统统拿给他签名。

“当时的书店，金庸全集全部断货。”记者肖女士记得，老爷子特别可爱，不管是不是粗糙的盗版书，还是根本没出版过的合集，他一概签名，就像大侠一样大气。肖女士说，当年大家陪金庸去

扶风山喝茶，他喝过的茶具都被老板留下了，“他是第一次来，对贵阳的印象非常好，觉得环境很舒服，当时百花湖烟雨蒙蒙，他仿佛到了黄老邪的桃花岛，凭湖风吹拂，一语不发，你能感觉到他的陶醉。”

当时金庸接了个电话，说自己在“风景很美的地方”。“这里比西湖好得太多了。”他说。

一高兴，他为百花湖题了一首诗：“翠湖清波映星星，星光灿烂照青山，如此湖山天下无，天然胜景百花湖。”

如今金庸先生仙逝，幸好有他留给贵阳人的记忆供人凭吊。 ■本报记者 李韵



本报记者当年采访金庸